

对东南亚少数民族边缘化与分离运动的新解读

——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

俞云平, 王雅琼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D73/77.3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0)02-0097-04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一书是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多年从事东南亚史研究的陈衍德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潜心合著的一部颇具深度的学术著作^①, 它以新的模式解读了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核心和热点——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 对这一专题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东南亚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民族地区”, “东南亚的民族关系也以其错综复杂而闻名”(第50页), 东南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自然也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存在的矛盾症结, 立足问题实质, 全面予以把握。书中不但有丰富翔实的、经过归纳整合的文献资料, 更有许多充满深刻洞察力的、批判性的分析。同时, 作者进一步着力于理论的探究, 提出了“经济—文化双重结构”这一释义模式, 并以此来阐释民族动乱与民族分离问题, 从而为关注此类问题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颇具前沿性的观察视角, 令人耳目一新。

综观全书的论述, 有两个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诠释了民族分离运动之矛盾症结, 指出其源于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之边缘化; 二是以经济—文化双重结构这一释义模式来剖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深层原因, 并强调文化是主要的矛盾方面。

上述两点在本书中是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作者先是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分离运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边缘化、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3项个案进行了详细阐述, 分析探究了其中的矛盾症结。同时, 作者认为, 研究对象的地理范畴虽是东南亚地区, 但其研究视野和学术框架不应局限于此, 而应放眼到“全球”。作者将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借助“经济—文化双重结构”的释义模式, 为化解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收稿日期: 2009-12-06

作者简介: 俞云平, 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王雅琼, 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

①本书全名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作者: 陈衍德、彭慧、高金明、王黎明,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为了便于叙述, 隐去其副标题, 下同。

一、诠释分离运动之矛盾症结——少数民族之边缘化

首先,“边缘化”一词借自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边缘与核心的关系,就是资本自核心流向边缘,利润自边缘流向核心,后来这种关系被借用来描绘一国之内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与落后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边缘化就是被推至经济的边缘,超越这个边缘就意味着劳动所得低于劳动中的付出”。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另一方面,“边缘化的边界也正在以非领土的区分形式被重新勾画”。从这个意义看,“少数民族的边缘化既意味着其聚居区的边缘化,又意味着其作为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弱化或边缘化”(第3页)。在书中相关问题的论述中,作者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投向少数民族的边缘化这一事实,但同时也关注东南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其他原因。

作者在开篇部分,首先点明“研究对象是东南亚的民族问题,背景是全球化时代”(第2页),并以“全球化、边缘化与分离主义”这3个核心词加以说明。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一是以时间为主轴的历时性观察,在回溯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将东南亚民族问题纳入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思考其时代转型;二是以空间为格局的深入分析,贯穿着“核心与边缘、分离与统一”等基本的矛盾运动之阐述。在盘根错节的民族关系网络中,作者集中地阐述了印尼的亚齐人、泰山山民与泰南穆斯林、菲律宾的摩洛人及其与本国主体或主要民族的互动,以此为代表来探讨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时代变迁。

亚齐的民族分离运动,依作者的观点,乃是“原发性的民族文化差异与后发性的经济利益冲突相结合,导致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生”(第107页)。印尼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这首先得益于亚齐的油气管道开发。然而70年代中后期,亚齐与中央政府在本地资源收益的问题上冲突日趋尖锐,“亚齐能源开发的好处大部分都被中央政府获取,其对印尼全国经济发展的推动比对本地的推动更大”(第90页)。政府未能采取相应措施对以农业为主的亚齐地区给予保障,而推行所谓的“绿色革命”也未能使农民获得实惠。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央政府对亚齐的开发,大量“名义穆斯林”身份的爪哇移民迁入亚齐,与当地作为“虔诚穆斯林”的亚齐人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产生撞击。亚齐地区不断被边缘化的态势,导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断加剧,进而爆发了民族分离运动。

按照作者的观点,泰国的民族问题“是较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北部和南部,与以曼谷为中心的泰国中部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社会经济不平衡极为明显。北部山民主要是因经济的落后而被隔离在中心地带之外,南部穆斯林则因其与泰族巨大的宗教文化差异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第138页)。虽然泰山山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比泰南穆斯林更为落后,但因为文化因素不突出,所以并未发展成民族分离运动。而泰南的情况则不同,“经济的落后与文化的差异、政治的隔阂结合起来,使泰南呈现出一种多重贫困的复合现象”(第142页)。穆斯林马来人因为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对泰国有疏离感,他们通过精神上的信仰维护族群认同,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结成统一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其他民族划分出文化鸿沟或族群界限。二战后,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泰南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得到强化,与泰族佛教徒的差异感增强。面对中央政府对穆斯林文化的整合同化政策,他们更加坚定地捍卫伊斯兰教的神圣地位,为延续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泰南民族分离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作者认为,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源于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下其边缘地位的形成与强化。历史上,菲律宾南部各族的统一借助于伊斯兰教,形成早期的封建制集权国家,并使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各方面得到了结合,宗教的同一性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然而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

加快, 菲律宾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海外市场。随之而来的是, 代表菲律宾天主教文明的中央政府, 通过政治上所谓的“整合政策”对南部地区进行改革, 其实质就是同化南部穆斯林。在摩洛反抗运动中, “文化之争才是它的本质, 而天主教徒总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穆斯林的斗争, 这正是南北矛盾难以消弭的症结所在”(第 226 页)。

从以上书中所举的 3 项个案来看, 印尼亚齐问题是因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所诱发的反抗文化问题; 泰国的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北部山民和宗教文化差异突出的南部穆斯林这两种不同侧重点的边缘化; 菲律宾所反映的是“不同宗教信仰犬牙交错的地区”之问题(第 281 页), 亦即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天主教)之间的文化鸿沟问题。作者的这些深刻剖析为理论概括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 - 文化双重结构”之释义模式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 提出了“经济 - 文化双重结构”的释义模式。这样一个新思路的建立, 对于世界民族研究的理论探讨不无裨益。作者指出: 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是指由“经济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多层次的贫困”, “其中文化上的贫困更具有本质的意义, 它决定了这一时代的贫困之性质”。而这种双重贫困正是全球化时代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的原因, 一方面, “经济上贫困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显性特征和民族动乱的表层原因”; 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文化自主权的丧失”, 从而“捍卫民族文化自主权, 重振民族精神以求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待遇”成为此问题的本质。只有充分认识到这样的深层原因, 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才会得到有效的解决(第 320 页)。

这里让我们想到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一 20 世纪末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也可以涵盖民族关系。亨廷顿认为, 随着冷战的结束, 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 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秩序。由于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 文明间冲突将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因此, 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他将文明定义为: “人的最高文化归属, 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 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1] 过去一般没有人认为不同文明的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 也没人尝试以文明为思考出发点去建构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 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对于国际问题还可以从文明的视野来研判, 并且可以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诠释民族矛盾。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分析包括民族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的新思路。^①

重要的是不在于亨廷顿的理论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而在于他发现了什么问题, 他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思考的空间以及什么样的思考视角。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命题, 其逻辑的必然是民族文化在民族(国家)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提醒世人要以智慧来谋求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本书作者是否受到亨廷顿所强调的“文化重要性”等基本思想的影响? 比照作者的观点, 他认为: “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 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 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其间时, 对抗才会不可避免地爆发”(第 310 页)。作者还指出, “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的急剧变迁”两方面的原因, 才使得文化成为“经济 - 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第 311 页)。

我国学者王辑思认为, 对于“文明冲突论”, “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重要的是, 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冲突层出不穷, 此起彼伏, 证明‘文明冲突论’击中了当代世界矛盾的要害, 触动了人们在宗教认同、种族意识、民族文化归属方面的敏感神经”。他还说, 亨廷顿“从来不相信‘理性选择’”,

^①陈乐民教授提出可以用“文明 - 国家 - 国际政治 - 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框架来研究国际问题。见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太平洋学报》1997 年第 2 期, 第 8 - 12 页。

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2]比照本书对于“经济-文化双重结构”的论述,我们认为,作者至少在客观上受到亨氏理论的影响,或者说在无形中产生了共识。当然,本书的观点也许同样会引起不同看法,但作者的匠心独具应该予以肯定的。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民族问题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权利的丧失是一个主要的矛盾。这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揭示的要义。

三、与作者的一点商榷

通读完全书后,我们以为,稍显微瑕之处是本书所举的印尼亚齐这一例。按作者意图,本书旨在说明文化对于化解民族矛盾的重要作用。但依事实来看,亚齐问题采用文化为主因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显得不够充分。如上所述,亚齐的油气资源对印尼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地方民众并未从中获益,相反却显示出贫困化的倾向。中央政府与亚齐地方之间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存在着的严重不均衡,导致了民族冲突的爆发。亚齐民族分离运动的发展轨迹更明显地表现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之争,此似非文化差异所能主导。我们把握问题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著名的民族主义问题专家安东尼·D.史密斯的观点是:“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边缘性共同体声称,由中心或关键性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忽视了他们的地区或使该地区边缘化。”^[3]这样的阐释似乎更能切中亚齐问题的要害。而作者却对此给出了文化的理由,让读者觉得略带牵强,尚不足以揭示此一矛盾之本质。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解。其实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对此有了更全面的解读。作者认为,爪哇与外岛资源分配的不公,“虽然以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割为表现形式,但却隐含着民族歧视的意蕴,因而具有了政治-文化的内涵”。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爪哇与外岛资源分配的不公交织着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因素。虽然后者才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实质,但前者的作用却构成了这种分配不公的依托和动力。”虽然这样的阐述已经比本书前进了一步,但如何将亚齐和中央的利益之争与文化的差异更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尚有待作者的努力。谨以此问题与作者商榷。

注释: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2]王辑思:《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世界知识》2009年第2期,第30、32页。

[3]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责任编辑:司 韦]